

藝文叢書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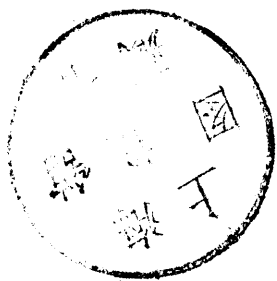
中  
英  
外  
交  
沈惟泰著



書叢文藝

交 外 英 中

著 泰 惟 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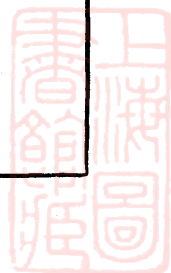


版出部輯編書叢文藝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上海圖書館藏書



8541 212 0005 26088



# 藝文叢書總序

在這個國家民族危急的關頭，我國的人民一般的感覺到我們社會的各方面都需要一番縝密的檢討及精細的研究。我們唯有檢討研究自己才能了解自己，唯有了解自己才能尋找出建立自己的目標與方向。同時，現在我國有成千成萬的國民對於我們國家民族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發生了無限研究興趣，提出了許多問題來急待解答。然而在敵人的鐵蹄踐踏之下，許多青年卻失掉了求學的地方；幸而未破敵人蹂躪的地方亦因種種關係不能繼續供給青年以求學的機會；而一般的民衆在這時期亦因各種文化機關的停辦或遷移而喪失了他們精神食糧的儲藏所。但是這個際會正是他們需要智識，需要精神食糧最強烈的時候。

我們鑒於這個大時代的需要來源的乾枯，決定約請國內的學者專家共同撰著一種叢書，每冊自三萬至六萬字，對於我們國家民族過去及現在各方面的具體問題作一種有系統的研究與分析。這一種叢書所擬研究與分析的問題非常之多，舉凡有關我們國家民族的問題，也可以說是中國整部文化的各方面，都希望能夠顧到。這種叢書是供給一般青年及民衆閱讀的，希望能夠對於我們國家民族獲到一些基本認識，發現當前社會各方面的複雜性，提出若干具體而急待策應的問題來，激起其研究中國企求認識中國的興趣，以期在任何地方，執行任何職務，都能隨時隨地檢拾問題而加以研究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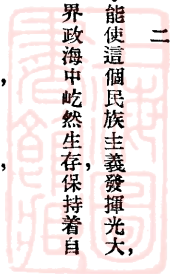
我們的國家民族現在是在建立自己的途程上邁進，在這征途之上有幾個指路的南針：

第一、中國的文化根本上是一都缺少政治色彩的文化，因此要針對着這一方面努力，研究怎樣才能凝結中國的個人及家

族單位使其成爲一個有機的團體，怎樣才能在中國樹立真純的優美的民族主義的根基，怎樣才能使這個民族主義發揮光大，普及於全民族每一個份子的心田裏，激動他們的政治興趣與熱力，以期中國能在波濤洶湧的世界政海中屹然生存，保持着自由平等的獨立的地位。

第二、在建立現代國家的時候，政治制度方面所需要的是怎樣才能使一般人民與國家政府結成一氣，共同奮鬥，國家離開了人民便無以生存，人民失卻了國家也不能生存。達到這個上下聯繫的方法只有實行民主政治。在各種政治典型之中，唯有民主政治才能適合我國當前的需要，我們唯有走民主政治的路線才能夠救亡圖存。但是我們卻並不要求一步登天跳到普及民主政治的終極，因爲這是事實所絕不容許的。我們只要認準了目標而一步一步地踏穩住腳向前走去。民主政治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徒有其表而乏其實的民主政治是虛偽愚昧的政治，絕對不能擔當建國的重任。同時，所謂民主政治也不是西方十九世紀與放任主義解成一氣的民主政治。人民固然需要自由，但要清晰了解自由的真諦，要的是有組織的自由，自由不容流爲放縱而中傷了政府的效率。薦愛自由過甚的人往往流爲無政府主義者；但無論何人現在都不能贊成無政府主義，無政府狀態之存在是對於敵國外患最有利的條件。

第三、政治建設的基礎是經濟社會的確定，而經濟建設的南針是工業制度的形成。在一個尚在農業及手工業時代，經濟基礎尙相當於歐西中古時代的社會裏，侈談爭辯西方的工業管制的各種主義是倒果爲因的現象。爲充裕我們國家民族的民生，爲鞏固我們國家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工業制度的急速確立是必要的條件。唯有一個工業化的國家才能在現代的世界生存，唯有一個工業化的國家才能使其人民的生活優美繁榮。我們現在要具備工業國家所產生的武備來抵禦外侮，我們卻同時



缺乏製造這種武備的工具及購買這種武備的資財。在這個畸形的狀況下，一般的人民自然是呻吟於租稅負擔的重壓之下。然而爲保護人民不受外強的殘殺蹂躪，政府又不得不徵收重稅來置備必要的現代武備。這是一個最尖銳的矛盾，其唯一的出路自在充裕民生以增加政府的收入；而充裕民生的不二法門即在盡量利用天賦給中國的寶藏。

第四、工業文明與現代科學是相輔而發展的；自然科學建立了工業的基礎，工業的發展又促成了科學的進步。中國的工業制度要在最近期內樹立起來，科學的提倡是必須同時兼顧的。現在科學的主要點在其方法與精神，這種方法與精神不只限於學術與技藝的研究，而在其應付一切事理的基本態度，不只在對付自然，並且在對付人類的社會。一個具備科學精神的人，對於一切問題簡潔地講來是不迷信任何沒有根據的符咒。我們不必諱言，中國現在是一個百孔千瘡的國家；對於這個病人我們卻不是在尋求一劑百病皆醫的仙丹靈藥；開這種藥方的人，無論中外，已經太多了，而中國的症候依然。據社會人類學家的研究，尋求百病皆醫的仙丹靈藥來醫治一個人的身體或一個社會的弊端是野蠻的初民的社會的辦法，具有最粗淺理性的個人及最簡單文化的社會都會了解這是絕不可能的幻想。這是科學的精神；這裏沒有符咒，沒有迷信。

本着這四種認識，我們敦請各位專家爲本叢書撰著。這種叢書是用深入淺出，簡賅而深切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問題的。各位撰著者都是對於各個問題有湛深研究的人，但他們卻不是眼光狹隘，西洋人所謂「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專家。」在分析解剖他們個別的問題之時，並不是只看見眼前的一個角落；在他們的腦海中飄浮着一幅整個中華國家民族的圖畫，以這整幅的圖畫爲背景描繪他們所擔任的一草一石。這裏沒有絲毫的成見，一切的意見都是從客觀的科學的分析研究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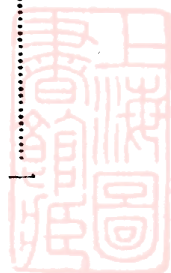
同時這一套叢書不只是供戰爭期間的需要；我們很奢的期望，在這次戰爭結束以後，在我們國家走上建國途程的時期，仍

然能夠陸續地一冊一冊的刊出，源源不絕的供給我國的青年與民衆以這種的讀物。我們不能以整套叢書的目錄奉告讀者也，就是因爲這個原因。

我們感謝各位作者的熱忱使這種叢書成功。我們十分歡迎讀者盡量的批評，就是最不客氣的批評亦當虛懷接受。同時我們更希望讀者能與我們通訊，作任何方面的指示與建議。我們是以這種坦白真誠的態度擺在讀者前面的，企盼讀者也能以這同樣的態度來教正我們。

# 目次

第一章	中英初期的接觸	一
第二章	鴉片戰爭	一一
第三章	鴛鳥政策	二六
第四章	「帶甲拳頭」的後果	四二
第五章	甲午戰後的中英關係	五四
第六章	中英外交之展望	七一



# 中英外交

## 第一章 中英初期的接觸

「伏思各國夷人在粵貿易，原屬天朝懷柔遠人。」

——盧坤

近代的中西關係，可以說始自歐洲人發現了通東方的海路以後。在陸路通商時期，中國與西方，無論在文化上或商業上，都不能有很多的接觸和交換；直接海路的溝通使得歐洲與東方的通商比以前便利，比以前安穩，並且比以前的贏利更大，因之兩方面的商業關係一天一天的增進，從此要彼此隔絕是不可能了。一四八八年葡萄牙人繞過了非洲的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不久，伐司哥達加麥（Vasco da Gama）即率領了他的艦隊初次來到印度的海岸。最初





來中國的西洋人也是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初年。但是他們的行爲簡直與海盜無異，這是歐洲人最初給予中國人的印象。隨之而來者有西班牙人及荷蘭人；西班牙人占據了小呂宋，在彼處與中國人貿易，後來因爲中國商人在該地頗有勢力，他們曾經兩次（一六〇三年及一六六二年）殘酷地屠殺了大批的中國商人；荷蘭人在中國的行爲，也不能引起中國人的重視，他們的使臣到北京時，因爲顧念商業的厚利，就不惜遷就了中國朝廷的意見，甘願自卑身分，接受了「三跪九叩首」的禮節。

總之，初來的歐洲人給予中國人的印象是「面目可憎」，「言語奇特」。中國人因之名葡萄牙人爲「西洋夷」，名荷蘭人爲「紅毛夷」。後來英、法等人來中國，也總脫不了「夷」字的尊稱。

英國商船初次來到中國海岸，是在一六三七年（明崇禎十年）。威特爾（Captain Weddell）的礮擊虎門可以算是中英兩國的「見面禮」。那時候葡萄牙人正與英國人作對，他們在廣州官廳前說了英國人的壞話；中英兩國的見面不客氣，這是一個理由。威特爾的用「拳頭」政策，結果有相當的成功：本來中國不准英國通商的，經此一打後，中國允許通商了。可是嗣後二十餘年，通商

沒有積極進行，一則因爲中英內部都有戰事，二則因爲葡萄牙人的阻礙。第二次英人來時，乃是一艘商船名叫 Surat 到澳門（一六六四年），但是因爲當時葡人反對及中國官吏對它的貨物擬課稅二千兩。這隻船在澳門逗留了五個月之久，未得貿易而返。此時東印度公司已享有英國與遠東貿易的專利權，它鑒於廣州通商不順利，於是與鄭經交涉，締結一約（一六七〇年），准許該公司在廈門台灣通商。後來英人又回到廣州去通商。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中國大開海禁，東印度公司得到了中國官方的許可，在廣州建設了一個商館。到十八世紀開始時，東印度公司領事賈其布（Catchpole）又得到中國官方的許可，在舟山及寧波等地貿易。後來成立一協定，一切商品均課稅百分之四。但是地方長官在規定的港稅及噸稅之外，復索額外稅百分之十六，且各船船長尚須出其他大宗款項，否則阻止糧食的供給。

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頒佈上諭，封閉了一切的通商口岸，祇留廣州一處，作爲中外貿易的唯一商場。這原因是因爲清廷覺到「夷」人分散各地，滋事生端，不勝其繁，不如聚在一起，易於「駕馭」。中國人怕事的心理，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從這時候起，一直到鴉片戰爭時爲

止，中外通商的歷史，簡直可以說是廣州一城的歷史。中國的閉關政策，至此可以說到了登峯造極的時期了。

那時候廣州貿易的情形是怎樣呢？在中國一方面，則有「公行」的制度。它享有對外貿易的專利權，並有劃定價格之權；但是它對於中國官廳，則負有擔保外人行爲的責任。這些經營對外貿易的商人，名曰「洋商」；每一隻外國船進口，都由洋商爲之擔保，如有「夷商」有不法行爲，亦唯洋商是問。一切「夷商」與中國官廳接洽事，均由洋商轉達，即外國領事官吏，亦必得假手洋商，始能通達中國官廳。平行公文更是談不到：中國官吏假使看見文件上沒有一個「稟」字，即擲還不閱。此外尚有「夷婦不得來省居住」、「夷商不准坐轎進館」、「銷貨完竣，不准逗留」等禁例。可見當時外人在廣州貿易的，確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但是外人所以能忍受這種種的苛遇，乃是因爲中國貿易利息厚大，及中國商人作事爽快。有一位「老廣州」Mr. Hunter 曾經說過，中國人的信用真好，說出一句話有如黃金一樣的靠得住，決不反悔，所以一個交易，往往口頭即可說定，用不着簽訂合同的。同時中國商人與外國商人感情亦很融洽，外人如有困難時，解囊相助的

事是常有的。

在外國人方面，那時在廣州的商館共有十三家，其中以東印度公司的勢力為最大。中國的對外貿易，英國的確占了最大的一部份。以一八一七年對外貿易為例子，我們即可知道鴉片戰爭前英國在中國貿易中所占的成分。是年廣州進出口貿易，英國占了二三、四六三、六〇一元，約百分之七十七。所以一切中外交涉，英國當然處於外人的領袖地位。這樣說起來，初期的中外關係，名之曰中英關係，亦無不可。

因為要改善這種通商制度，英國曾經兩次遣派使臣至清廷報聘：第一次是在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使臣是馬加特尼伯爵（Earl of Macartney）。當馬加特尼來華時，清廷給予一盛大的招待；但是他進京的船隻上，卻掛了「英夷朝貢」等字。那時清朝正在極盛之時，一切都想誇揚於外人之前，所以不惜大事鋪張，以示外人「天朝」之隆盛。馬加特尼在京時，清廷待之亦優禮有加，但是他正式的使命——改善中英商務關係——卻不讓他有機會談及。待他走後，清廷命兩廣總督轉告英人，說馬加特尼所要求的各款，都已經一一駁斥了。第二次亞墨斯特（Lord

Amherst) 的報聘，是在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結果更是可憐。亞墨斯特坐了驢車一路顛到北京後，皇帝立刻要召見他，並且要他行三跪九叩首的禮節。亞墨斯特非常憤怒，回答說：「我生平祇對上帝和女人下跪。」可惜那時中國當朝的沒有一個女人，以致「下跪」的問題沒有方法解決；亞墨斯特的使節，差不多是被清廷迫逐回國的。

亞墨斯特的使命失敗後，中英在廣州通商的情形，又維持了近乎二十年。到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東印度公司在中國貿易的專利權期滿，英國政府正式任命律勞卑（Lord Napier）來華，管理一切英人在華商務，中英的衝突於是乃更不可避免。東印度公司究竟是商業機關，他祇要有利可圖，還能忍受中國官吏的驕狂。律勞卑是英國任命的官吏，他的一舉一動，都足影響到國家的地位，他當然不願承受以前東印度公司「大班」所居的地位。他遵照了英國首相柏墨司登（Lord Palmerston）的訓示，想直接與中國官廳開始平等的關係。他一到澳門後，就直接前來廣州，投書於兩廣總督盧坤前，請求約時晤談，以便解釋英國在華通商制度的變遷及他自己來華的使命。但是中國官廳不肯接收這封信，因為信面上沒有一個「稟」字，而且不是由「洋商」

轉呈的盧坤的立場當然是代表中國歷來的觀念，就是沒有任何國家可以與「天朝」平行的。在他的奏章內，他說：「查中外之防，首重體制。該夷目律勞卑有無官職，無從查其底裏。即使實係該國官員，亦不能與天朝疆吏書信平行。事關國體，未便稍涉遷就。」盧坤於是「諭飭洋商傳諭開導，」命律勞卑退回澳門，然後依照原定辦法請求來省。因為律勞卑不能遵從，中國於九月二日宣告「封船」，停止一切與英人的貿易。三日後，兩隻英國兵船於虎門口強行進口；中國砲台以砲擊之，彼亦開砲還擊。雖然英船終於抵達黃埔，可是律勞卑鑒於事情之無望，於是決意回到澳門。那時他的身體已經是很壞——廣州的夏天和與盧坤的爭執對於他的康健都有很大的影響。他於十月十一日死於澳門。這總算暫時結束了一件不能解決的問題。

繼律勞卑而任英國駐華貿易總管者台維斯 (John F. Davis) 及羅濱孫 (Sir George Robinson) 都採取一種靜默的政策 (A policy of quiescence)。他們鑒於律勞卑的失敗，知道那時與中國爭取平等待遇是沒有結果的——除非訴之武力。沒有舉動的政策還可以暫時維持英國在華的商業，以待本國政府有了一定的方針，或是有一個較好的時機，再提出這問題。這是台

維斯及羅濱孫的意見。到一八三六年冬，義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接任管理英國在華商務後，鴉片問題已日漸嚴重，成爲中英兩國爭執之焦點了。

在這初期的中外接觸，有幾點可以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中外的通商完全是西洋各國強加於中國身上的，中國對之並不表示熱心。那時候中國完全是一個自足的國家，並不需要任何外國的商品。「我中原數萬里版輿，百產豐盈，並不藉助夷貨，」外來之物皆不過以供玩好，可有可無，這是當時人的見解。而中國的產品，如絲茶大黃等物，則爲外國所競需。至於關稅，「天朝視之，」亦屬「無關毫末。」所以當初的通商，在需要方面說起來，完全是一面的。因爲他們需要通商，他們願意接受中國通商的條件；因爲中國並不需要通商，中國政府往往以「封艙」爲要挾，爲對付外人的利器。還有，中國人對於商業，向來不注重的：「市僧」是商人的別名，向爲社會所輕視的。「士農工商」四行，「商」字居於末。外國人這樣着重商業，爲中國人所不能了解。他們冒了重洋的危險，爲了盈利而來中國貿易，也不能引起中國的尊敬。

第二，中國「自足」的心理，不但表現於物質方面或商品上，在知識方面，它也有揚揚自滿及

不求進取的趨向。老實說，那時候中國人對於西方的知識，比我們現在對於火星上的知識也好不了多少。但是它對於新來的西方人，不但不設法去了解他們的文化，反而輕輕地加上「蠻」「夷」兩字，以掩護自己不願求新的懶性。這是我們文化一千多年來沒有進境的結果。自從有史以來，中國所接觸的各個民族和國家，它們的文化水準都比較低，它們對於中國文明，都表示欽佩和羨慕，並且大家都想去模仿它，給它自尊心一種最大的諛揚。這樣慢慢地形成了它的誇大與自滿，以為它是天之驕子，它的文化已達到了顛頂，再也無可進步了。它以「天朝」自居，以為世界上再也沒有像它一樣的國家了。「天下」之大，僅及中國的邊疆而已；除此而外，都是「蠻」「夷」之邦，祇能對於中國稱臣朝貢，不足與言平等之交涉也。「四海臣服」「蠻夷朝貢」這種觀念深深地印入了中國朝廷；他們對於西洋各國，也以這種標準量之。這種自大的心理 (Superiority complex)，將來需要很大的代價去變更它的。

第三，在初期的接觸時，我們已經可以見到東西文化的差別：一個是好靜，一個是好動；一個是保守，一個是進取；一個着重內心的修養，一個着重行爲的表現；一個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觀



念，一個則有時刻不能安定的趨向。前者以幾千年的道德風俗習慣爲背景，仍是依照了時間永不會變換的老方法做事；後者自從「文藝復興」及「宗教革命」之後，好像得到了一種新的血液的灌輸，科學進步正在蒸蒸日上，而「工業革命」卻亦已種下一根萌芽。那時探險家如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等，已經替歐洲找到了許多新的大陸，歐洲正在享受以前所不曾有過的那樣繁榮；各國莫不爭先恐後，向海外發展，以求致富。中國文化因爲缺乏變遷和進步，已呈衰老之景象，而西方文化，卻因找到了一個新的單方，又回復到一個從新發育的時期了。

西方文化既是向海外發展的文化，中國又要擯之戶外，那兩面的衝突是不可避免了。英國在這時期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它在亨利八世（Henry VIII）時，向羅馬教皇宣告了獨立，已漸漸形成一個「現代的國家」。一五八八年打败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The Great Armada）後，便奪了海上霸王的地位。國內壞的天氣與海外厚的利益驅使了英國人出外經商，而在不知不覺之間，替母國造成了一個空前龐大的帝國。以它代表「西方文化」，再適當也沒有。所以初期的中英接觸，也可以說是東西文化最初的接觸；中英的衝突，也可以說是兩個文化的衝突。

## 第二章 鴉片戰爭

「本大臣家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

——林則徐

中英通商的最初時期，英人每苦於找不到合於中國人需要的物品，每年來買中國的絲茶，都得以現銀交換。但是到了十八世紀後期，這情形漸漸地變了，英人居然找到一件能夠暢銷於中國的物品——鴉片。一七七三年，東印度公司享有了在印度產製鴉片的專利。從此以後，把印度的鴉片推銷於中國，它得到了空前未有的贏利。鴉片的進口，也是一年一年地增加：在十八世紀末年，鴉片的進口平均每年約二千箱，不到二十年，這數目增加了一倍，迨一八三〇年時，鴉片的進口已將達二萬箱。茲將一八一六年至一八三六年間鴉片進口的數量及價值表列如下：



年	份箱	數價	值
一八一六	三、二一〇	三、六五七、〇〇〇元	
一八二〇	四、七七〇	八、四〇〇、八〇〇元	
一八二五	九、六二一	七、六〇八、二〇五元	
一八三〇	一八、七六〇	一二、九〇〇、〇三一元	
一八三二	二三、六七〇	一五、三三八、一六〇元	
一八三六	二七、一一一	七、九〇四、二四八元	

中國政府對於販賣及吸食鴉片，向有禁例。一七二九年，即有禁止吸食鴉片的法律。一七九六年，鴉片的進口也禁止了。一八〇〇年，嘉慶皇帝重申前諭，禁止鴉片進口及國內種植鴉片。所以在法律上，鴉片是一件違禁的物品，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中國官吏的作弊以及英國商人的厚利使得法律成爲具文。私販鴉片不久即成爲一種周密的制度，當時人有記載如下：

洋船私帶煙土來粵，於附近虎門之大魚山洋面另設夷船囤積，稱爲鴉片薹，並有夷目兵船，名爲護貨，同泊一處，勾通土棍，以開設錢店爲名，暗中包售煙土，呼爲大窩口，如省城之十三

行，聯興街多有此店。奸商到店與夷人議價，立券爲憑，到躉交貨，謂之寫書。又有包攬走漏之船，名曰快蟹。來往如飛，呼爲插翼；其船星夜遄行，所過關津遇有巡丁追邏，竟敢施放槍礮。關吏莫敢誰何；又不報官懲辦，是以肆無忌憚。此種快蟹見有一二百隻之多，凡由躉送貨至窯口者，皆係此等船包攬。如巡船通同作弊，按股分贓，包庇行私，其弊尤甚。其銷售各路：如福建之廈門，直隸之天津，廣東之雷瓊二府，皆由窯口立券，到躉交貨。其餘各省私販入口出境，均係快蟹船包送。出境必由之口，如南海之仙館，汎，蘭石，汎紫，洞口，落松，海口；香山屬之黃圃；三水屬之西南，汎，包埠等處。其由大窯口分銷內地，悉因奸民串同各衙門蠹役開設私局，名爲小窯口，各處城鄉市鎮，所在皆有。

鴉片之禍，這樣一天天的蔓延，使得中國朝廷非常焦慮。第一，從道德的立場上看起來，鴉片對於人民的爲害是太大了；它能使得人民的身體衰頹，使得他們的志氣消沉，使得他們的生計窘細，中國假使不設法禁絕，那國家民族的前途甚爲可憂。第二，從國家的經濟方面看來，紋銀的漏出也是一個極大的問題。鴉片的消費在一八三〇年以後，每年總在一千萬兩以上。許乃濟在他倡議

「弛禁」的奏章內說：「向來紋銀每兩易制錢千文上下，比歲每兩易錢至千二三百文，銀價有增無減，非銀有偷漏而何以中原易盡之藏，填海外無窮之壑，日增月益，貽害將不忍言。」所以到一八三六年時，鴉片問題成爲當時一般士大夫憂懼的中心。許乃濟首先動議「弛禁」，「准令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交行後，只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洋銀應照紋銀一體禁其出洋。有犯被獲者，鴉片銷燬，銀兩充賞。」他以爲這樣可以防止白銀的漏出；至於鴉片的本身，他以爲根本無法禁絕，不如乾脆開放爲佳。他的主張，有兩點是錯誤的：第一，他僅僅乎注意到白銀的漏出而忽視了鴉片對於人民的害處。要知鴉片成了癮以後，人力是差不多不能擺脫它的桎梏的，它對於人民的爲害，較洪水猛獸爲更甚。在禁的時代，煙禍已日漸蔓延，開禁以後，更何堪設想！至於他以爲鴉片是無法禁絕的，所以不如不禁，那更是講不過去。法律所禁止的殺人竊盜，亦何嘗能够禁絕，難道因之我們就應當公開地准許殺人竊盜？何況鴉片的不能禁絕，乃因官吏的不能認真，認真辦起來，當然可以見效的。第二，他以爲「弛禁」以後，准許鴉片入關，祇准以貨易貨，「每年可省中原千餘萬金之偷漏。」但是他不知道以有用的貨物，易爲害的鴉片，對於國家的富源也是一種損失，與白銀

的漏出何異！

許乃濟「弛禁」之議，引起了當時激烈的辯論。除了兩廣總督鄧廷楨表示贊同外，在朝諸臣都熱烈地反對。朱醇、許球、袁玉麟等都主張嚴禁鴉片，根除煙禍。黃爵滋則主張嚴辦吸食之人，以絕鴉片之需求，蓋「無吸食者，自無興販，無興販則外夷之煙自不來矣」。湖廣總督林則徐，也三上奏章，主張用嚴厲的辦法嚴禁鴉片，並且以他在湖北湖南的成績，證明這辦法是可以成功的。最後道光皇帝的意見決定了：偷運、販賣及吸食鴉片，都在嚴禁之列；他說，「朕於此事深加痛恨，必欲淨絕根株，毋貽遠患。」此時上自王公，下至庶民，因吸食而得罪者處處皆有。一八三九年一月三日，上諭派林則徐爲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辦鴉片事宜。

林則徐是當時官員中一個特出的人物，他在「貪污」遍地的環境中，能够絲毫不苟，「鞠躬盡瘁」地替國家做事，他的人格的確是可以佩服的。他一到廣州後，就決定了一個雙方並進的政策：對於國內則禁止販賣及吸食鴉片，其已有癮者，亦限期戒絕，在這方面，他到任了數月之後，即有顯著之成績；對於國外他想永遠斷絕鴉片的進口，所以第一步是命外人把所有違禁的鴉片，一例

繳出，以便焚化，第二步是令他們出具甘結，聲明嗣後來船永不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卽正法。繳納鴉片是斷絕目前之患，出具甘結則以防禦將來。但是在這方面，他遇到了英人的反對。因之，爲了要貫徹他的政策，結果是引起了中英的戰爭。

那時在英人方面，義律是總管駐華貿易事務。義律對於保護英人鴉片的營業，早就具有決心；他以為他的職任是保護英人在華的商業，鴉片當然也在其內，但不知鴉片在中國是違禁之物，他政府既然命他遵守中國的法律，他的保護鴉片不但是違反了中國的法律，而且是沒有遵從他本國政府的訓令。可是再進一步說，鴉片的營業是當時英人莫大的利藪，要英人放棄鴉片，豈不是「與虎謀皮」？義律的政策不過是代表當時一般英商的意見而已。那時英人明知他們的兵力是可以戰勝中國的，所以他們既然反抗中國禁煙的政策，中國當然是要失敗的。

在英人目光中，中國的官吏是都能動以金錢的，所以林則徐的來廣州查辦鴉片，他們起初也不大重視，甚而至於有人以爲他的諭繳鴉片是一種斂錢的方法。但是這裏他們是錯誤了。林則徐因爲英人遲遲不把鴉片全數繳出，而義律由澳門進省，想於夜間帶同煙商囓地（Dent）等潛逃，

於是採取了一種嚴厲的辦法，把廣州十三家洋行都封鎖起來，斷絕他們的貿易交通，並且撤退了一切他們所雇傭的華人。這就是英人所謂「強制的監禁外人」，即以之為後來所以用兵的理由。林則徐的強硬手段，結果使英人繳出了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鴉片，這鴉片後來是當眾焚燒的。至於「具結」問題，那更是困難。義律呈繳鴉片以後，非常氣憤，一面通知英人離開廣州（五月二十二日），一面請求印度總督開發兵艦來華保護英人的生命及財產，同時他報告給首相柏墨司登一切經過的情形，主張「中英的關係，有重大變更的必要。」

剛在這時候，又發生了一件林維喜的案子。林維喜是於七月七日在尖沙村被一羣酒醉的英水兵毆傷斃命的。這問題的衝突之點是在誰有司法之權。義律根據了一八三三年英國議會通過的條例，堅持他有組織法庭，審判此等案件之權。林則徐則根據中國法律，指定要殺人的凶犯。因為義律不肯交出，同時又因私販鴉片的英船，仍在洋面逗留，於是又採取了強硬的手段，要求澳門總督，把英人都逐出澳門。英人離開了澳門，祇能到香港的荒島上去。此時乃在「封船」之期，人民不得售賣食物與英人。九月四日，義律飭船向鄉人購買食物，為中國巡船所阻止。於是英人乃開礮



以擊中國船隻，這是中英戰爭中的先聲。事後義律頗悔此舉，他宣稱他並沒有與中國開釁之意，雖然中國的禁止糧食的接濟他認為是不友誼的行爲。

中英的正式衝突，乃在十一月初。據英國方面說，十一月三日中國水師提督關天培，率領了二十九隻戰船到英兵船“Volage”及“Hyacinth”前面，要求交出毆死林維喜的兇犯，因而引起戰事。但是據林則徐說，此次戰事的原因乃是爲了「具結」問題：

近日各國貨船絡繹具結，俱經驗明帶進黃埔，英國貨船中首先遵結者曰灣喇（Captain Warner of ‘Thomas Coutts’），亦已進埔貿易。其次遵結者當郎（Captain Daniet of ‘Royal Saxon’），於九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三日），正報入口，詎有該國兵船二隻於午刻駛至穿鼻，其一卽七日內向九龍滋擾之吐密（Captain Smith of ‘Volage’），其一則近來新到之華倫（Captain Warren of ‘Hyacinth’），硬將已具結之當郎貨船追令折回，不得進口。提臣關天培聞而詫異，正在查究間，吐密一船輒先開放大砲，前來攻擊。關天培亟令本船弁兵開砲回擊，並揮令後船協力進攻。

中英戰事，自律勞卑來華掌管貿易以來，已經醞釀多年了。一個夜郎自大的國家，抱着惟我獨尊的見解，不肯以平等待遇施之他國，遲早總要受一次很不愉快的教訓的。但是中英戰事，不始於律勞卑而始於義律，不始於平等待遇問題而始於鴉片問題，此乃中英外交史中最不幸之事實。當律勞卑與盧坤相持不下時，曾遺書柏墨司登，請求用兵力以處罰中國官吏之侮辱英國使臣，但柏墨司登未嘗採取任何舉動。至義律時，義律致兩廣總督之書，封面上乃有一「稟」字，而此信亦由「洋商」所轉呈，可見律勞卑所力爭者，義律皆已放棄。但至林則徐迫令呈繳鴉片及出具不帶鴉片之甘結時，義律則毅然反抗，鋌而走險，而中英戰端開矣。所以這次戰爭，至少在當時中國人目光中看來，鴉片是唯一的原因。假使這次戰爭祇是爲了爭取平等的待遇，祇是爲了改善通商的情形，那戰後的中國人總會了解中國政府是咎由自取，他們對於西方文化的東來，也不致那樣地反對鄙視，與規避了。但是這次戰爭，實在是爲鴉片而起的，總脫不了公正歷史家「鴉片戰爭」的斷語。義律的決心保護一種違禁的貿易，使得中國禁煙政策不能施行，乃是這問題的中心。同時林則徐也下了禁煙的決心，他說：「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

於是雙方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此事在英國方面，既負了「師出無名」的干係，與中國方面，也覺得我們之錯，乃錯在要實行一個極可贊揚的政策，他們對於西方道德的觀念，可想而知了。

鴉片戰爭開始後，英人不在廣東作戰而攻取定海。定海失陷（一八四〇年七月六日）而道光皇帝對於林則徐的信任亦喪失。我們祇要把道光三次的「諭」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他態度的變遷：第一次諭是在林則徐迫令英人交出鴉片時候，他說「卿之忠君愛國，皎然於域中化外矣。」那時君臣如何相得！第二次諭是在林則徐驅逐英人至香港後，中英關係非常緊張時，他尙說「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誠卿等不可畏葸，」可見他對於林則徐的強硬政策，完全表示贊同，第三次諭是在定海失守以後，那時他的態度完全變了，他責林則徐「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則查拿犯法，亦不能淨，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際，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英人占定海的用意乃在以之爲交涉脅迫之利器。一八四〇年八月九日，英國全權代表懿律（Admiral George Elliot）及義律率艦隊至大沽口，以便就近與北京所派全權大臣進行交涉。道光一面下旨教七省火速設防，一面令直隸總督琦善負責與「夷目」交涉。琦善的人格，見解和

政策，恰恰與林則徐相反。在人格方面，林則徐是中國舊道德的代表，忠、勇、信、義都是他的特點。但是琦善是中國一般官僚的代表，他的本領是貪污、圓滑、說假話，他後來奏報與英國交涉的情形，與事實頗有出入。在見解方面，林則徐對於英國的估量很低，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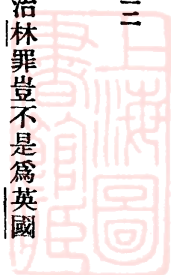
夫震於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堅礮利而稱其強，以其奢靡揮霍而豔其富。不知該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數丈，祇能取勝外洋，破浪乘風，是其長技，惟不與之在洋接仗，其技即無所施。至口內則運掉不靈，一遇水淺沙膠，萬難轉動。是以貨船進口亦必以重賞倩土人引導，而兵船更不待言矣。從前律勞卑冒昧一進虎門，旋即驚嚇破膽，回澳身死，是其明證。且夷兵除槍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不難制也。

他對於中國自己的兵力，很有把握的。可是琦善對於英國的估量，比較正確。他以為他們的「船堅礮利」實在可怕。同時對於本國的力量，他也有自知之明，他覺得山海關的礮尙是「前明之物」，任軍事者「率皆文臣，筆下雖佳，武備未諳」。所以在政策方面，林則徐主戰，他主和；林則徐着重鴉片問題，他與英人交涉時，對於鴉片問題簡直不提。鴉片戰爭到了琦善的時期，是中國主和派得勢

之時。

琦善與懿律義律交涉的結果，以爲英人所不滿者，惟林則徐一人。那重治林罪豈不是爲英國「代伸冤抑」嗎？於是林則徐便成爲「替罪羊」，作爲求和英人的犧牲品。道光皇帝不但革了他的官職，並且把他放逐伊犁。是以中英之戰始自林則徐，然戰事一開，而林則徐即被罷免。當時一般人都以爲林是抗英最適當的領袖，而林自己也頗有自信；但是他始終沒有機會一試其技。英人不攻廣州而攻定海，更堅強了當時一種英人懼林的傳說。所以事後關於林則徐造出了許多「神話」。中國鴉片戰爭雖敗，但是敗後對於英人並不真心佩服。這也是中國事後不願接受西方文明的一大原因。

琦善當初最大的任命是把英人騙回廣東，使他們不致在附近京畿一帶騷擾。在這一點他是成功的。道光皇帝於是深信他的三寸之舌可以退卻英國侵犯之師，命他爲欽差大臣，赴廣東與英人交涉。但是到了廣州以後，琦善才明白他自己找了一件極難辦的事去做。英人的賠款割地等要求，使他非常爲難，他無可奈何，祇能採取了小商店講價式的外交，儘量與英人「磨難」。後來英人



不耐煩了，於是戰端又開。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英兵船攻擊沙角礮台及大角礮台，數小時後即被占領。經此一仗後，琦善祇能答應英國一切的要求；雙方遂於一月二十日簽訂和約。媾和的條件是：

(一) 香港割讓，(二) 賠款六百萬元，(三) 中英官員直接來往，並處平等地位，(四) 廣州開市。

但是這和約，事後中英兩國政府均加否認。在英國方面，以為義律所得到的為太少；在中國方面，道光皇帝不能明了何以中國朝廷替「英夷」「伸冤」以後，他們還有這樣的無理要求。他對琦善的信任，因之低落。一八四一年二月十六日，他降旨責琦善「迷而不返」，把他「革職鎖拿」，並將他的家產「查抄入官」。從此中英的爭執，又祇能訴諸武力矣。

南京條約是鴉片戰爭當然的結果。以一個東方老弱頹廢的國家，戰一個西方新興的霸王，勝敗是可以預期的。在這次戰事中，中國軍事的弱點已完全暴露出來了：軍器不如人不用說，就是士兵的精神與紀律，亦何嘗能够給人家比！至於將帥，戰前說大話而臨陣脫逃者，亦大有人在。當時清廷明知講和是「下策」，但是除了講和之外，還有什麼別的法子？中國打了一年半功夫，已經是精

疲力盡，而江寧又危急萬分，將士俱不堪再戰，清廷祇能遣使求和。南京條約是簽字於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於英船康華立司（Cornwallis）上，中國的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鑑——當然無置喙之餘地，祇能承認一切英國的要求。英方的代表是樸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

南京條約及此後所簽訂的條約整個地變換了中外的關係，這是中國不平等條約之始。從此以後，中國受國外的侵略，將無已時。在鴉片戰爭以前，外國對於中國總有相當的敬畏，他們所要求的，祇是合理的政治上的關係及商業上的便利，但是中國既不願以平等待遇施之他國，又不願修改它商業上的限制。鴉片戰爭對外則暴露了中國——也可以說東方文明的——一切的弱點。但是我們假使能夠從這次教訓中，增加我們對於自己的認識，那「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最可歎的是中國仍舊執迷不悟，不要說不願採取西方文明，以改善國內的情形，就是對於西方文明的了解和認識，也不願與聞。反而從此以後，竭力想減少與西方的接觸。一個自以為是的國家當然要遭遇失敗的，而在失敗以後，仍是不求進步，那真是不可救藥了。

南京條約中最要緊的款項是：（一）香港割讓，（二）五口通商——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及

上海，(三)賠款二千一百萬元——其中三百萬元是補償商人欠款，六百萬元是賠償所焚燒的鴉片，其餘爲賠償軍費，(四)協定關稅，(五)平行文書。鴉片問題在條約上沒有提及。英代表樸鼎查曾勸中國「弛禁」鴉片，但是中國代表無論如何是不願採納的。在南京條約的附約中，領事裁判權亦有初步的規定，此事後在中美望廈條約中有更詳細的規定。

在這時候英國是開發中國的急先鋒。英國得了南京條約的利益以後，美國、法國、以及瑞典、挪威都相繼與中國訂約。從此以後，中國是再不能摒西方各國於戶外了。



### 第三章 鴉片政策

「英夷之最疑者，中華大吏不將其苦衷據實具奏。」

——何桂清

南京條約以後的一二十年，是中英外交史中最堪遺憾的一頁。在中國呢，鴉片戰爭的教訓，但沒有使得政府感覺得他們的國家是事事落後，非努力自強不足以應付西方的進展，反而使得他們對於西方的國家，取「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極力設法規避或減少與它們的接觸。他們的心理乃與駝鳥無異，看見一樣可怕的東西來了，趕快把頭埋在土中，作為不聞不見，以為這樣可以避免取禍。這個算為當時朝廷的方針，真是可憫亦復可歎！同時這戰爭對於中國人民——尤其是首當其衝的廣州人民——的印象是中國受了莫大的冤屈。在他們目光中，這戰爭之始是由英人阻止中國政府實行一個自救的政策，戰爭之敗乃因英人的鬼計使得林則徐去職，戰爭之後英人



又向中國政府獲得割地賠款通商等條件；所以他們對於英人——以及一切的外人——祇有懷恨和輕視，他們對於西方文明，亦不能信服。這也種下了這時期中中外衝突的根原。

至於英人方面呢？第一次條約的締結給了他們許多權利。但是嘗到了這些權利之後，他們尙嫌權利還不够。在鴉片戰爭中，他們看清楚了中國兵力的不振，他們知道祇要採用武力或武力的威脅，即能使得中國屈服。於是不論事之當否或理之曲直，他們即用強權以相迫。這當時謂之「鐵艦政策」(‘Gunboat Policy’)。不幸而這時期中，英國當權者爲柏墨司登，他對於這政策是非常贊同，以致中英之間，終久又要釀成武力的衝突。

此時外人在中國的恣肆，亦毋乃太甚。鴉片的私販，華工的販賣，都是公然行之，毫無忌憚。條約上給予他們的領事裁判權，他們用以保護他們人民的非法行爲。凡有華人控告外人的案子，沒有一件可以得到公正的判決的，所以中國人受了外國人的冤屈，簡直是無可申訴。

清廷規避外人的方法是把一切與外人的交涉都移在廣州——離開京師最遠的地點——辦理。那時候的兩廣總督，實際上就是中國的外務大臣。着英自從簽訂了南京條約及中美中法條

約以後，差不多成爲當時的「撫夷專家」了。在他兩廣總督任內，他的政策是一味敷衍外人，以避免戰禍。此時廣州的人民，反「夷」的情緒很高，民「夷」衝突的事件，不一而足，而尤以廣州入城問題，爲中英爭執之焦點。

允許外人進廣州的城門本是一件極微細的事件，當時廣州人民何以反對得那樣劇烈，除了他們深恨外人外，沒有別的解釋。但是歷來外人在廣州貿易，總是限於在城外居住，城門以內是爲「夷」人所不能涉足的。戰事以後，五口通商是根據條約上的規定。在其他四處，外人進城都沒有問題。惟獨廣州則遭拒絕。英人堅持要進城，因爲他們認爲不許進城是歧視外人的表示。可是中國官廳因爲人民的反對，不敢擅允；他們並且指出條約上也沒有明文規定准許外人入「城」。英人乃以交還舟山問題與廣州入城問題牽連在一起，說假使中國不允英人入城，英國即將緩交舟山。這把著英嚇壞了。幸而舟山是於一八四六年如約交還了，可是同時英人聲明廣州入城的事，祇允暫緩舉行，並不是放棄要求。翌年三月，有英人一行，至距廣州約四十里之佛山鎮閒遊，被鎮人用石毆擊。英港督德庇時 (Sir John Francis Davis) 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向中國示威。他立

刻命艦隊攻取虎門礮台，把礮台上的礮眼釘塞。這「礮艦政策」很有效果；著英祇能答應英人的要求；訂定二年以後（一八四九年四月六日）廣州開城。

著英是領略過英人的利害的，所以是年一八四七年，冬日黃竹岐地方有英人六名被鄉民毆斃的案件發生時，他惟恐德庇時又要實行他把「黃竹岐三村洗平」的威嚇，立刻將正犯四名，不待部覆，先行正法，其餘參與暴動者，亦均嚴辦。這件事總算使得英人滿意，沒有引起其他的糾紛。

但是著英萬事遷就以順「夷」情的政策，不爲朝廷所滿。黃竹岐案以後，著英卽奉調入京，而兩廣總督之職，則由徐廣縉繼任。此時朝廷中，有一派以爲民團足以禦「夷」，故民心不可失。道光皇帝任命徐廣縉署理兩廣總督的「諭」內，有「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則外侮可弭，嗣後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遷就，有失民心」之句。徐廣縉是「林派」嫡系的外交家，林則徐給他的信內，也告他「人心可用」，所以徐廣縉來替代著英是不祇普通官吏的調遷，而是朝廷政策之轉變。

至咸豐帝卽位（一八五〇年）後，這政策的轉變愈見澈底：「撫夷」派的要角如著英，如軍

械大臣穆彰阿，都獲咎去職。這也可以說是外人驕恣的反響。中國「遷就」外交的經驗，幾年來不但喪失主權，而且陡增了民「夷」的衝突。而當時大家以為英人「懼」林，起用林則徐，或採用他的主張當可卻英人於疆外，於是「撫夷」政策衰，而「禦夷」之說又興矣。但是無論「撫夷」或「禦夷」，無論「遷就」或「強硬」，中國的政策都是根據於與外人之接觸使之減至最低之限度。這種觀念上，中國對於國際生活，還是根本不能了解。換一句話說，中國並不是跟着時代走的國家，它最大的願望，是回到以前閉關自守的時期。

徐廣縉接任不久後，英人即催促關於著英所允許廣州開城的事，必得如期實行。但是民情的反對，仍是依舊：將屆開城的日期，廣州城內，遍處招貼，說如有外人進城，必遭殺戮，同時城廂保衛壯丁，聚有數萬人之衆，都是預備阻止外人進城。徐廣縉當時的地位是非常困難的，假使踐約開城，則必引起民「夷」的衝突，假使不允開城，則英人或將施用武力強制入城。所以他一時猶豫不決，在三月中（一八四九年）的奏章內，他尙在憂懼「拒之過峻，難免激成事端……值此經費支絀之時，再生枝節，上廛宵旰，爲臣子者，稍有天良，何敢出此。」但是最後他是決定了拒絕開城，因爲第一，

他以為「虛聲恫喝，乃夷人之慣技，其缺費裁餉，見於新聞紙……是其勢絀力窮，已屬強弩之末，婉阻之未必遽開邊釁。」第二，他以為順從民意而生戰事，則「衆志成城，尙有爪牙之可恃，」否則「許其進城……人心瓦解，必至內外交訌。」這是徐廣縉貫徹了朝廷不失民心的意志。

英人看見中國對於這問題，這樣堅持，覺得即使入城，亦徒增雙方的惡感，所以咬翰 (Sir G. Bonham) 祇能將入城事作為罷議。可是中國方面，以為這件事是外交上大大的勝利，朝廷賞徐廣縉子爵，世襲雙眼花翎，賞廣州巡撫葉名琛男爵，世襲花翎，其他人員士紳，亦均有賞賜。人民方面，亦與徐廣縉建碑紀念。這件事給英人知道後，大為不滿，他們覺得以寬大的態度對待中國，中國反以為他們示弱，這使得他們對於以後的事件採取一種更強硬態度的決心。

徐廣縉的一任，總算平安地過去了。但是葉名琛繼任為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後，中英的交涉，更見複雜了。葉名琛是一個少年得志剛愎自用的人。他自以為得到了「馭夷」的訣竅，覺得中英外交到他手中就要有個新紀元了——可是不幸而這新紀元是進一步地使得中國遭受侵略。簡單的說起來，他「馭夷」的方法是把外人置之不理，無論他們要求商議什麼事件，他總是不予接見。

最會說大話的人往往就是最膽小的人；他的說大話，他的高傲不見外人，亦許就是所以遮蓋他畏懼外人的心理的反應。可是中國外交在他手中，又誤盡了國家的事。

英人對於南京條約及虎門通商條約所得到的權利，尙嫌不夠，所以每思修改條約，以擴充他們的權利。但是南京條約是政治條約，是無期限的，即虎門通商條約，也沒有修改的年限。英國修約的要求，是根據於中美望廈條約內十二年後雙方得派代表和平交涉修改條約的條款。英國因爲約內有最惠國待遇的規定，所以拿望廈條約內十二年修約的條款作爲適用於南京條約，因之他們要求在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修約。我們現在都知道這要求是不合法的，因爲修約期限本身不能包括在最惠國條款之內；英國要擴充權利，祇能等待美國修改條約（當在一八五六年）之後，假使美國得到了新的權利，英國自然可以根據最惠國待遇而享受同樣的權利。無論如何，英國是不能先美國而要求修約的。至於美國條約中，關於通商章程祇有稍微修改的規定（望廈條約第三十四款），但是英國所要求的款項，竟包括內地通商，鴉片公賣，公使駐京等等極廣泛的條件。這與稍微修改的原意，當然不可同日而語。可是中國當局，因爲昧於國際公法，既不據理力爭，祇

是設法延擱，避免與英人見面交涉。這樣愚笨的應付辦法，真是可笑亦復可歎。

英國港督咆吟 (Sir John Bowring) 因為在廣州會不到葉名琛的面，所以約同了美國代表麥蓮勒 (Robert McLane) 及法國代表咻喇咻隆 (Alphonse de Bourboulon) 於一八五四年十月連袂至上海，說明他們的意思是要到天津去交涉。清廷聞得他們北上的消息，頓時驚慌失措，一面諭令嚴防海口，一面派員與之交涉，令彼等折回廣東。三國代表至大沽後，見交涉毫無結果，都覺得非用武力是不足以達到目的，所以祇能暫時作罷，等待時機，再作舉動。

這個時機不久就蒞臨了：因為「亞羅」事件的發生，英人又得到了一個用兵的藉口。「亞羅」事件的事實大略如此：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中國官廳因為聽說「亞羅」船上的水手係犯案的匪徒，所以派員到船上把水手十二名逮捕；但是——據吧嘎吼 (Harry S. Parkes) 說，中國官員在執行職務時，曾將船上所掛的英國旗扯破。「亞羅」本是一隻中國的船，它的船主是中國人，所逮捕的水手也是中國人，內中並有一名是著名的巨盜，所以葉名琛說不但它沒有權利掛英國的旗，並且這件事完全是中國自己執行它的司法權，與英國無涉；至於扯破英國國旗之一說，他根



本否認。但是據英國方面說，這隻船是在香港領的執照，所以是英國船；中國官廳如欲逮捕犯人，應當通知英國代為執行。英國領事吧嘎嚙，是強權政策的信徒，加以葉名琛的過去對待外人使他積恨在懷，所以一定要利用這時機給葉名琛一個教訓。他堅持中國官員的扯破英國國旗是對英國的侮辱，所以除了要求交還拘捕之人外，他還要中國政府書面的道歉。葉名琛起初交還了九名犯人，但是吧嘎嚙不肯接受。後來他又加了一名，最後（十月二十二日）將十二名全行交出，可是他始終不肯道歉，因為他否認曾經扯破英國的國旗。於是英國海軍與兵攻占通達廣州的各路砲台，於二十七日，竟開砲攻擊省城；而所謂「亞羅」戰爭，從此開始矣。

「亞羅」戰爭開始時，可以說是葉名琛與吧嘎嚙的戰爭。這消息傳到英國時，英國下院是反對在華施用武力的。但是首相柏墨司登，對於吧嘎嚙的「帶甲拳頭」政策，頗為贊賞，他覺得這是使大英勢力伸張於中國再好也沒有的機會，所以他把下院解散，而重行選舉的結果，他的政策居然得到通過。他因之任命囉囉唎（Lord Elgin）為特使，統帶兵衆，前來中國，要求修約。

「亞羅」的案子本是一樁極微細的事件，因為這件事而開始戰爭實在是說不過去的。但是

歷史上我們知道兩個強弱懸殊的國家，因為極微細的緣故而開戰的例子是不一而足。一個國家，假使存心侵略，隨便遇有什麼事都可以當爲出兵的藉口的。中英第二次戰爭的根本原因，乃是因爲英國感覺得它第一次條約上所得的權利還不够。南京條約祇把中國閉關的門打開了一半，結果是廣州十餘年來不愉快的經驗。葉名琛身爲欽差大臣，辦理對外事務，可是各國代表，簡直見不到他的面，這當然是增益了他們的不滿。他們覺得中國把欽差大臣設置廣州的外交制度，根本是存心規避國際間的責任。要改善這個情形，也是此次所以興兵的一大動機。

剛在這時候，法國也有一件事可以作爲給中國過不去的藉口：這就是馬神父 (Père Auguste Chapelaine) 的案子。馬神父是法國的傳教師，在廣西境內，因爲被疑爲「長髮」餘黨，所以被西林縣拘拏拷打致死。這本來也是一件極微細的事件；何況中國的把馬神父作爲叛黨正法，雖是違反了條約上外人犯罪由外國審判的規定，不過馬神父的到內地傳教，根本也就超越了條約上的範圍。然而法國一定要把區區一件殺害教士的案子，作爲開釁的緣由，實在的目標乃是它想與英國聯合起來，以求擴大他們在條約上已經得到的權利。它派噶歷勞士 (Baron Gros) 爲使臣，會

同囉喇，與英國採取一致行動。

同時美國也想修改條約。俄國本來沒有海路通商的權利，也想趁此機會，獲得與英、法、美、同等的待遇。但是俄、美兩國，雖派代表與英、法兩國會同進行，可是它們是不用武力的。如此，四個西方的強國，兩個用硬功，兩個用軟功，立意要把中國的門戶完全打開，以遂它們侵略之願。

囉喇是一八五七年七月到香港的。是時英國在印度有事，所以沒有餘力攻中國。到年底的時候，英法聯軍，才開始攻擊廣州。可是自從「亞羅」事件發生以至英法聯軍來攻廣州，爲時一年餘，葉名琛名爲封疆大吏，又兼綜辦外務，既不備戰，亦不言和，祇是坐在衙門中，束手無策。等到聯軍攻陷廣州，有人勸他趕快逃避，以免受辱，可是他還不聽從，又不殉難，以致身爲俘虜，被英人囚於印度。如葉名琛者，可謂不但誤國，亦且辱國矣。

聯軍占領廣州後，乃會同俄、美代表，移兵北上。他們到上海時，中國朝廷想勸他們折回廣東，再派欽差大臣與他們商議。但是這套玩意，現在不能生效了。他們仍是連艦馳至白河口，要求中國派全權大臣，與他們商議。清廷派直隸總督譚廷襄爲代表，但是他們嫌他權限不足，不與商議。僅美國

使臣喇衛廉 (William B. Reed) 與之商議，但亦無結果。英法兩國，於是再試武力，攻占大沽砲台。清廷無奈，祇能派大學士桂良及吏部尚書花沙納爲欽差大臣前往辦理，同時又起用耆英，以爲他或能把英人騙回去。但是耆英的伎倆，早爲英人所洞悉，他不但沒有見到英法代表的面，而且被英國通事啞啞 (H. N. Lay) 當場凌辱。這也算是中國初期外交中一個「撫夷」專家的結局。

經過桂良花沙納與四國代表迭次磋商後，和議稍有頭緒。但是朝廷中頗有一派因爲和議條件太苛，而主戰的。恭親王奕訢，也就是其中之一。不過桂良花沙納，知道戰是毫無把握的，所以終久勸了咸豐皇帝，接受和議的條件。在一八五八年六月間各國的和約都簽訂了——中俄，六月十三日；中美，十八日；中英，二十六日；中法，二十七日。這就是所謂天津條約。

天津條約給與各國的權利，較之南京望廈等條約，當然更爲廣泛。各國條約中，都有「最惠國待遇」一項，所以任何一國得到的權利，其他各國都可以享受的。就好像第一次中外簽訂的條約中，美國望廈條約可以算是模範，這次天津條約中英國的條約也可以算是模範。這次條約中各國

所得到最主要的權利大概如下：（一）公使駐京。這條款雖爲當時中國政府反對最烈，但是我們現在都知道這是國際間交往所必需的，反對是毫無理由的。「亞羅」戰爭之所以發生，中英政府的隔膜乃是一大原因。英國有了與葉名琛的經驗後，疑惑中國的疆吏，常常蒙蔽朝廷的，更感覺得公使駐京是不可少的條件。（二）內地遊行。這權利的本身是沒有什麼，在無論任何國家，祇要有合式的護照，本來到處都可以去的。但是在中國，各國都享有領事裁判權，內地遊行是要引起無限的糾紛的。美國代表咧威廉，當時也承認這是「最危險的權利」。（三）內江通商。在中國商業非常落後的時期，內江通商當然使得中國的商業，更不能與外國競爭了。（四）加開商埠。這不但擴大了外人的商業，同時也增加了中國政府的責任和困難。（五）信教自由。這條款不幸而引起了此後無數的教案。教徒從此在中國人中成爲一種特殊的階級，受外人的庇護，這當然引起一般人的反感，因之人民與教會的衝突，乃無已時。（六）外國兵艦，不但可到沿海商埠，並且亦可到內江遊行。這一款當然是有損獨立國家的主權的。從此「引狼入室」，後患無窮。（七）領事裁判權有更詳細的規定。最奇怪的是這樣喪失主權的條款，當時負責交涉的人反以爲「便利」。（八）鴉片公

賣。英國鴉片戰爭的目標，至此完全達到了。（九）賠款。賠償英國四百萬元，內二百萬元爲兵費，二百萬元爲英國僑民的損失。賠償法國兵費二百萬元。

清廷雖然答應簽字天津條約，但是內中有四款是反對得非常之烈。這四款是：（一）公使駐京，（二）內江通商，（三）內地遊行，（四）賠繳兵費始退還廣州省城。咸豐皇帝是想設法挽回的，所以他命桂良花沙納到上海，待換約時再與他們商議，取消這幾款，以爲「一勞永逸」之計。他願意以取消關稅爲交換條件。這種愚陋的見解，當然是可笑得很，不要說外人既訂了條約，決計沒有在換約時取消之理，而取消關稅之議，假使提出去，豈不是更增加他們覬覦之心！幸而桂良等力陳此議之不可，結果沒有提出去。上海挽回的計劃，當然是歸於失敗。此時英國已派嚙喇唎之弟嚙嚙（Frederick W. A. Bruce）爲公使，法國派唏囉唏囉（Bourboulon）爲公使，專待進京換約，在上海時簡直不與桂良等會面。俄國的使臣，此時已於陸路進京，與中國政府換過條約。美國使臣華若翰（John E. Ward）則隨同英法北上。

他們到大沽口時，看見中國已將彼處封鎖。事前中國官員，早已通知三國公使進京之路，當由

北塘上岸，如欲由大沽進口，則當遭拒絕。但是英法使臣堅持進白河前赴天津。這是他們錯誤的條約上規定，祇是在北京換約，沒有說如何北上的方法，所以中國政府，當有權限指定採用何處路徑的。可是英法兩國，祇知有武力，他們見中國已將大沽口封鎖，於是又施行政擊。但是被中國擊退。他們因之回到上海，預備再派兵北上，而中英之釁端又開矣。

英法乃仍派囉囉與噶歷勞士帶了強兵北上，要求中國除在北京換約外，尚須道歉及增加賠款。中國仍堅持由北塘上岸。聯軍於是再度攻佔大沽礮台（一八六〇年八月二十一日），陷天津，徑向北京進發。中國見京城危急，再派桂良等與之議和。聯軍因彼等無便宜行事之權，又拒絕與之商議。清廷乃改派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為欽差大臣，勸聯軍折回天津商議。但聯軍仍堅持欲赴通州。正在往返磋商之際，中國忽又做出一件極愚拙的事件：這就是把英法所派到中國方面來議和的五個官員及隨從之人，在他們從中國使寓回去時，半途截劫。這不但違反國際公法，亦且有乖常理。被虜的共三十九人，其中有吧嘎，為中國朝廷所切齒痛恨的人，及囉囉之祕書陸祺（Loch）。他們被中國監囚起來，備嘗各種虐待，所以等到放回去時，祇有十八個是生還的。聯軍知

道這消息後，當然大憤，誓非打進京師，不肯罷休。此時北京城內，早已混亂不堪，皇室都已逃至熱河，留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及左侍郎文祥與聯軍交涉。聯軍攻進北京城，當然是一件極容易的事。中國於是祇能放還吧嘎嚨等一行人，俯首乞和，而與聯軍簽訂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北京條約把九龍尖割讓與英，天津條約內的賠款，英法各增至八百萬兩，天津開為商埠，而法國的條約內，又有一項把一七二四年以來所收復天主教的財產，一例發還的規定，同時又給與法國教士租買土地，建造房屋的權利。這些規定將來要引起無窮的糾紛。此外圓明園的燒燬算是懲罰中國劫奪及監囚聯軍議和的官員的；這一點是嚨喇哈所堅決主張的。在後人看起來，這是英人毀壞文明永遠洗不脫的一點痕跡。

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完成了南京條約所開始的工作：把中國閉關的門攻破了。中國此時內有太平之亂，幾乎顛覆了清室，對於外來的侵略，更是無法應付。經過這次經驗以後，中國至少對於西洋的武力是心服了。



## 第四章 「帶甲拳頭」的後果

「中國自周朝以來，常說內修外攘，試問至今內修若何，外攘能否？」

——威妥瑪 (Sir Thomas Wade)

英國柏墨司登 (Lord Palmerston) 所主張的用「拳頭」來攻破中國閉關的門，經過了二十年的爭鬪，到一八六〇年時總算完全成功了。但是這不僅對於中國前途是一件最不幸的事實，對於中英的交誼上，這也是一極可惋惜的污點。中國政府的頑固不化，不願以平等待遇施之他國，固然是令人不能無怨，可是英國的處處施用武力，以強迫中國接受他們的見解，也是極不聰明的措舉。一八六〇年以後中外關係的路途上滿鋪着荆棘，中國國運一天一天的低落，實在是初期中英外交播下的種子。

英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武力，把中國的國家是征服了，可是中國並不能因之而對它們發生



友誼僅僅極少數的兵隊，就很輕易地攻進中國京師，迫走太后皇帝，在當時的一般人看起來，的確是極足驚異的一件事。中國一向視爲「蠻夷」之邦的國家，誰知竟如此「猖獗」，使得「天朝」狼狽到這樣地步，這是給一般憂國之士深思的材料。在同治初年間，中國的確一度想採法西方，把國家「自強」起來，再與西方各國抗衡。頭腦清楚的政治家如恭親王、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都是感覺得西方的文明，也有可以取法的地方——尤其是關於技術及軍事一方面的事。恭親王是目睹聯軍攻進北京城門，親身與他們簽訂和約的人，他所受的刺激比較的深，所以事後他總主張趨向維新的政策。曾、左、李都是「中興」名將，他們與外國人的接觸也比較的多。因之他們的思想也比較前進。我們祇要一看他們的論調，就知道他們的見解，是很值得佩服的。他們看清楚，第一，國際生活是一個現代國家所不能避免的。中國以前想規避與外人接觸及不願以平等待遇施之他國，那是完全錯誤了。所以恭親王主張設立總理衙門，管理一切對外事務，以免再發生葉名琛時期的外交上的誤會。總理衙門就是外交部的前身；總理衙門的設立就是中國自動參加國際生活的初步。這當然是合乎時代的舉動，因爲交通工具日益發達，世界的距離日益縮小，國際間相互的

關係也日益密切，中國即使要避免國際生活，也不爲時代潮流所許可了。恭親王是總理衙門的催生婆及乳娘，他的確是當時皇室中一個特出的人物。

第二，他們承認中國有許多地方不如人；既不如人，就不應恥於學人。恭親王說得最好：「若夫以師法西人爲恥，此其說尤謬。夫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西洋各國，雄長海邦，各不相下者，無論矣。若夫日本蕞爾國耳，尙知發憤爲雄，獨中國狃於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爲恥，而獨以學其人爲恥，將安於不如而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這都是對於中國守舊的病，「一針見血」的話。

第三，他們以爲「自強」是唯一復興中國的途徑。恭親王說：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爲要，練兵又以制器爲先。自洋人構釁以來，至今數十年矣。迨咸豐年間，內患外侮，一時並至，豈盡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勝之兵，而無制勝之器，故不能所向無敵耳。」他覺得中國的兵，非不可用，他們的弱點，乃在兵器之不如人，技術訓練之不如人，所以他主張中國應當採用外國的兵器，購買外國的船礮，並設法雇用外人，鑄造兵器，教導戰術。曾國藩亦以購買洋船「爲

救時第一要務。」李鴻章則批評當時一般士大夫「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爲奇技淫巧，以爲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爲變怪神奇，以爲不能學。」爲中國之大病。左宗棠當時就主張練海軍，建船廠，他說：「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於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傲以無也。」至於學習西洋文字，李鴻章亦認爲是了解他們科學必需的工具。他說：「彼西人所擅長者，測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尙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泐有成書，經譯者十纔一二，必能盡閱其未譯之書，方可探頤索隱，由粗顯而入精微。我中華智巧聰明，豈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技巧當可由漸通曉，於中國自強之道自有裨益。」所以在北京同文館設立之後，他又奏請在上海添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左宗棠在福建，亦請設立藝局，選少年穎悟子弟，延聘洋人，教以語言，文字，算法，畫法，以爲將來製造輪船機器之本。但是中國效法西方以圖自強的政策，祇有極微細的成就，何也。我們假使以之比較同時的日本「維新」政策，則兩方面的成績相去何止千萬里！日本自從潘萊（Commodore Perry）與之訂約以後，立刻感覺得非採用西方文明，不足以生存於現代的世界中，它差不多從一個中古式

落後的國家，立刻一變而成爲一個前進的強國。這對於中國及東亞的前途，是一個最重要不過的關鍵。假使中國當時同日本一樣，貫注全部心力以變成一個現代的國家，那何至有甲午之役！何至有今天這樣的浩劫！所以中國的失敗，中國的在東方失去領袖的地位，不始自甲午，而始自「自強」之不能貫徹。現在的世界，是一個競爭的世界：我們不進步，或是進步比人家慢，那我們就是落後，我們就要遭受人家的欺凌，這是不易的至理，沒有第二句話可說。至於中國當時自強之所以失敗，最大的原因當然是因爲一般人的守舊和自大，對於世界的大局和西方的文明，還是不能有真切的認識。我現在舉大學士倭仁的反對同文館學習西方文藝的論調，以代表當時有識階級中守舊的意見。他說：「竊聞立國之道，尙禮義不尙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爲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未聞有特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且夷人我仇也。……今復舉聰明雋秀，國家所培養而儲以有用，變而從夷，正氣爲之不伸，邪氛因而彌熾。數年以後，不盡驅中國之衆咸歸於夷不止。」這種論調，在當時是很普遍的。

中國一般「聖賢之徒」的文人，還是以爲中國的文化再也沒有進步的餘地了；他們以爲學「夷人」是一樁極可恥的事情。不幸而中國此後幾十年朝廷的政策，都是取決於慈禧太后。她守舊的腦筋，支配了中國的前途，要求改革及進步當然更是困難了。像恭親王、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之輩，具有進步的思想，真是「鳳毛麟角」，極難得的人物。但是即使他們這幾個人，也是僅僅在技術方面，願意效法西方，對於西方文明的精神，以及他們所以強國富民之道，也是不願探討。李鴻章說：「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可是中國除了關於武力之外，對於西方的文明還是不能信服。至今國內一般人還有「東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質文明」的論調，以滿足他們自誇的心理，那真是白受了一百年來外國不斷地侵略的慘痛的教訓了。每一念及日本一與西方國家接觸，卽一躍而趕上與它們爲伍，而我們則因「恥於學人」，結果不但不能擺脫西方帝國主義的桎梏，而且還要受學西方的日本的侵害，就覺得我們國家的所以衰弱，我們自己就是最大的罪人。

此外，中國對於西方文明的不能信服，英國的處處採用強權政策，也應當負相當的責任。在中

國所看得到的西方文明，就是兵艦礮火以及外人驕橫不可一世的態度。所以中國所佩服的，也祇是他們的兵力與武器。中國初期的「自強」，差不多完全是限於學他們的造船，買他們的槍礮，請他們來練兵，這幾項。至於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西方的道德學問，中國完全不願聞問。然而中國之所以要學他們的方法來修武備爲什麼呢？爲的是要學了他們的方法，以爲報復的地步。所謂「將外洋各種火器講求，以期盡窺其中之祕，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也。所以中國那時的心理，一方面是「懼」外，因爲怕他們的武力，一方面又是「仇」外，因爲恨他們以武力欺壓我們。日本對於打破他們閉關的潘萊，非常感戴，在國內立了他的銅像以紀念他的功績；中國對於打破它閉關的英國以及英國初期的代表義律，樸鼎查、吧叻嚙嚙，實在是不能發生同樣的情感。中英初期的外交，我們不能不承認對於兩方面都是一個不愉快的經驗。

一八六〇年以後，中外關係——除了中法爲越南問題衝突外——享受了三十多年的和平。但是這和平，並不是雙方相處融洽的和平，乃是一個人被打倒在地上而沒有力量還拳的和平。中國此時不但是遭受了「太平之亂」，使得國家筋疲力乏，在西面邊境的省份內，又有回徒的叛亂，

經過了多年才能平復。所以對於外來的侵略，更是無法抵禦。中國的衰弱，既已暴露，外國的覬覦，自然不能倖免。英、法、俄、美諸國，已與中國訂了天津條約，它們所要得到的商業上、宗教上、法律上、各種權利，大致都已滿足。於是繼它們而來的，乃有普魯士（德）、葡萄牙、丹麥、荷蘭、西班牙、比利時、意大利、日本等國，都在同治年間，先後與中國訂約。這些條約，除了日本外，都是大同小異，根據英、法、美、俄條約為模範的。中日條約，乃是唯一互惠的條約。但是到了甲午之戰後，日本也要加入「列強」的團體了。

中國與各國訂了條約以後，最困難的問題是覬覦問題。中國答應各國公使駐京，已經是萬不得已的事，至於他們要求覬見皇帝而不行跪叩的禮，在一般守舊的人看來，更是不可思議了。所以從一八六一年起，中國一直推託皇帝尙未成年，不便召見各國使臣。到一八七三年，同治已正式視政，於是無可再為推託了。最後經過了數日往返的商議，中國才答應定期覬見，各國使臣行三鞠躬的禮。這總算打破了一層中國積習的偏見。

遣使出洋也是在同治年間實行的。在一八六六年，當總稅務司赫德（Sir Robert Hart）回



國時，中國曾經遣派過斌椿等隨同他到歐洲去觀光。斌椿所著的「乘槎筆記」是記載一個從不知道中國以外情形的人初次到歐洲遊歷的印象，很可以一讀。中國正式的遣使，乃在一八六八年的遣派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蒲安臣本是美國駐北京的公使，他自從一八六一年來中國後，給中國官員的感情很好。恭親王說他「處世和平，能知中外大體。」當他任滿預備回國時，中國政府覺得他既懂得外國情形，對待中國的態度又好，於是就請他代表中國向外國去解釋中國的情形，以消除他們對於中國的誤會。同他出去的尚有中國官員志剛及孫家毅。蒲安臣等第一個是到美國去。在美國他得到很好的印象，並且代表中國，與美國簽訂了一互惠的條約。從美國他又到歐洲。在倫敦、巴黎、柏林，他們都很客氣的接待他，但是他沒有獲得什麼實際的結果。一八七〇年，他死於俄國聖彼得堡，正在他出使的途中。

最痛心的是從這時期起，中國的疆土一天天的縮小，藩屬一天天的喪失。第一，西北一方面，有帝俄那隻熊，在英法聯軍時，它就趁火打劫，施用陰詭的手段，不費隻兵，而騙取了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及烏蘇里江以東，數十萬里的土地。在回亂的時候，它又乘機佔據伊犁，意圖不還。後來中

國幸而派會紀澤出使俄國把伊犁索還。第二，在東面，有新興的帝國日本，好像一隻狼狗，垂涎於附近的琉球、台灣、及朝鮮。最後，在西南方面，有英法兩國，像虎豹一樣，想大口吞食中國的土地。中國在越南問題上，忽戰忽和，舉棋不定，終久是把這西南的藩籬斷送了。至於緬甸，本來也是向中國朝貢的，但是從一八二六年起，即已漸漸地入於英國的勢力範圍中。英國併吞緬甸的工作，於一八八六年完成；是年並得中國政府之承認。

英法兩國，都想從西南方面，向中國推進：法國以越南爲根據地，英國以緬甸爲根據地。所以雲南一省，乃爲英法競逐之地。在回亂的時候，英國曾經派過兩次探險隊到雲南去，但是都沒有成功。回亂平復後，一八七四年，英國又想派第三次探險隊從雲南出發，同時又派翻譯官馬加理（A. R. Margary）由北京出發，在雲南會同其他人員。但是當馬加理在滇緬邊境地方等待英國官兵時，忽被戕害。據中國方面說，馬加理是被野人殺害的；據英國方面的調查，則謂馬加理係被中國兵隊殺死的。無論如何，這是一件細小的案子，但是英國公使威妥瑪（Sir Thomas Wade），看見英國以往「礮艦政策」的成功，也要借此案件，小題大做一番。剛巧雲南地方官吏辦事敷衍，給威妥瑪

一個要挾的藉口。經過長期交涉後，威妥瑪又採用海軍示威的故智，以威嚇中國屈服。中國無奈，祇能派李鴻章前往交涉，而與之訂立煙台協定（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三日）。煙台協定除了賠款撫卹二十萬兩及遣使道歉外，尚有給馬加理案毫無關係的條款：如加開商埠四處（宜昌、蕪湖、溫州、北海），關沿江六處（大通、安慶、湖口、武穴、陸溪、沙市）為輪船上下客商貨物口岸，鴉片於進口時一併交納釐金，以後可任意運往內地等項。這些條款，不但是中國人心中不甘，就是當時外國人看來，也覺得是不應當的。

中國這次遣派道歉的使臣，是郭嵩燾氏。從此中國設駐外使館。郭嵩燾自己是思想比較前進的人，他出使的日記，饒有趣味，現在錄下一段，以表當時一個開通的政治家的觀感：

近年英法俄美德諸大國角立稱雄，創為萬國公法，以信義為先，尤重邦交之誼，致情盡禮，質有其文，視春秋列國殆遠勝之。而俄羅斯盡北漠之地，由興安嶺出黑龍江，悉括其東北地以達松花江，而與日本相接。英吉利起極西，通地中海以收印度諸部，盡有其南洋之利，而建藩部，香港設重兵駐之。比地度力，足稱二霸而環中國，逼處以相窺伺，高掌遠蹠，鷹揚虎視，以日躋其

富強之基，而絕不一逞兵縱暴以掠奪爲心，其構兵中國，猶展轉據理，爭辨持重而後發，此豈中國高談闊論而虛憍以自張大時哉？輕重緩急無足深論，而西洋立國，自有本末，誠得其道，則相輔以致富強，由此而保國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禍亦反是。班固匈奴傳贊有曰：來則以禮接之，畔則以兵威之，而常使曲在彼，處爭猶然而況其所挾持者尤大而其謀尤深者乎？劉雲生自謂能處洋務，至是亦自證其所知之淺，而曰：處今日之勢，惟有傾誠以與各國相接，舍是無能自立者。

但是時人對他的批評是「殆已中洋毒，無可采者。」

總之，這時期的中外關係，是英國二十年來武力政策的反響。中國一度會想「自強」起來，但是因爲守舊的勢力太深而「自強」不能有多大成就。此時中國對外的心理，又是怕，又是恨。因爲怕，所以能夠維持三十多年的和平；因爲恨，所以不時有各種案件發生。教案是特別的多，而以天津教案最爲嚴重，差一些鬧出大亂子。這都是表示中外不能安於相處。不久，這仇外的心理，發瘋似的爆發出來，而造成中國對外史中最不名譽的一頁。

## 第五章 甲午戰後的中英關係

「英國無永久之友，亦無永久之敵；英國惟注意永久之利益。」

——柏墨司登 (Lord Palmerston)

甲午之戰以後，中英的外交關係乃轉入一新的階段。從鴉片戰爭到英法聯軍，中國的外交差不多完全是對付英國的進展。英法聯軍到甲午之戰的時期，中國與其他各國的外交雖然是一天天的重要了，中英外交仍是佔着中國對外關係中主要的地位，英國仍然是欺壓中國的列強中的領袖。但是馬關條約以後，中日關係一天天的嚴重，等到日俄之戰以後，日本在北方又取俄國的地位而代之，它成爲中國外交最主要的對象了。慢慢地日本的野心展放，它成爲危害中國生存的唯一敵人。所以這時期的中英外交，我們所最注意的是英國對於中日問題的態度，而並不是中英問題的本身了。



日本本來不是一個重要的國家，甲午之戰以後，頓時一躍而躋於強國之列。這一方面是日本自強的成功，一方面是中國自強的失敗。在遠東這一邊，自從西方文明侵入以來，最重要的事實是中國與日本現代化的競走。中國先有機會和西方接觸，先有機會領略他們文化的意義，至少在鴉片之戰一役，中國應當了解他們的武器和戰術，都比我們高明，但是中國輕輕地放過了這機會。英法聯軍以後，中國雖想自強，但是守舊和自大使得自強不能澈底。可是日本一與潘萊訂約以後，立刻了解它是一個落後的國家，所以努力「維新」二三十年以後，它竟有驚人的成績。這樣，在外國人目光中看起來，日本是一個前進的國家，中國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他們對於日本的進步，既是驚佩，又是同情。英國是第一個了解日本將來的重要。在甲午之戰的前夕，它首先答應日本修改不平等的條約。甲午之戰以後，它對於日本更看得起了。他覺得日本的強盛足以牽制俄國在遠東的勢力，一九〇二年它破例地與日本訂立同盟：這是「有色人種」第一次享受到這樣的榮幸。從此至華盛頓會議時，英國在遠東的政策，一直是親日的政策。最近中國民族的覺悟漸漸地表現出來了，日本企圖獨霸東亞的野心也慢慢地暴露出來了，英國對華的態度才見變更。

甲午之戰使得中國在國際間的地位更是低落。甲午之戰以前，中國雖然是弱，外國對於這老大帝國，尚有相當的尊敬。那時候外國的勢力尚未侵入中國本部，而左宗棠的收復新疆，曾紀澤的討還伊犁，都表示中國在軍事上及外交上，都還有相當能力，即中法越南之役，中國亦未全敗，所以外人對於中國還不敢十分輕視。但是甲午之役中國被一比它小得多的東方國家打敗，而且打得一敗塗地，這使得外國對於中國的估量，頓時一落千丈。他們於是覺得中國是不可救藥了，將步非洲之後塵，爲列強所分據。當時外人所著關於中國的書，多以「中國之割裂」(“The Break-up of China”)，「中國之瓜分」(“The Partition of China”)命題。所以每一個國家，都想趁此機會，分一杯羹，於是乃有租地及劃分勢力範圍之舉。英人之來中國，最大的目的本是爲經商的，至此亦被捲入「瓜分」的漩渦。

此時中國已成列強分據的局面，外交已失卻自主；中國的國運，往往不是取決於北京，而取決於東京、聖彼得堡、柏林、倫敦、巴黎及華盛頓，以及它們中間的如何妥協或如何牽制。任何一國的舉動是足以牽動全局的。所以德國一發動租借膠州灣（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簽約），俄國也繼之

而租借旅順、大連（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法國租借廣州灣（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英國租借威海衛（一八九八年七月一日）及九龍（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九龍半島之尖，已於北京條約中割讓與英。他們除了強租中國港口之外，還在中國境內劃分勢力範圍，以爲「瓜分」之前奏曲。法國首先獲得中國之承認海南島不得割讓他人（一八九七年三月十五日），後復獲得中國承認東京（安南）鄰近之省份不得割讓他人（一八九八年四月十日）；英國獲得中國之承認揚子江流域不得割讓他人（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一日）；日本獲得中國之承認福建省不得割讓他人（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德國是早已看定了山東省；俄國則以長城以北一帶爲它的勢力範圍。列強中間，復各相承認彼此之勢力範圍：一八九八年四月三日，英德答應互相尊重彼此的勢力範圍；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英俄也有同樣的定約。祇有意大利想租三門灣，遭中國之拒絕（一八九八年三月）。

此外，列強復以鐵路政策，侵入中國。俄國於一八九六年九月八日獲得中國政府允許，西伯利亞鐵路得穿過東三省北部，直達海參威，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復獲得自哈爾濱修造鐵路直



遼遼東半島的權利。法國於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日獲得中國政府允許，可以將安南鐵路延長至中國境內，一八九八年四月十日復獲得建造自安南東京邊境至雲南府鐵路的權利。德國於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獲得在山東省建造自膠州經濰縣至濟南及山東邊界與自膠州至沂州經萊蕪以至濟南兩鐵路的權利。英國亦於一八九七年二月四日獲得使緬甸鐵路與雲南鐵路銜接的權利。

這是列強在中國境內競爭路權的幾個重要的例子。至於中國自己想修造的鐵路，因為沒有經費，也祇能仰求於外國資本。外國借資的條件，往往非常苛刻。盧漢（即平漢）鐵路是向比利時借的，約中有自保定至漢口之鐵道建築費，由華俄道勝銀行先行支付的規定。正太鐵路是向華俄道勝銀行借款的，約中有一「如期內不能還清，則銀行有代管鐵道之權」的規定。此時英國與俄國在遠東競爭極烈，俄國既得到上述路權，英國亦借款於中國，建造自山海關至新民屯與牛莊間之鐵道。嗣後英國復強迫中國承認英國有建造津浦南段、滬寧、浦口至信陽、蘇州、杭州、寧波間、山西、河南、浙江及直隸有南襄陽間、廣九各路之權利，英國緬甸路可以延長至揚子江流域；英人在山西、河南、浙江及直隸有

採礦權利。美國亦由合興公司借款與中國修造粵漢鐵路。法國亦獲得中國之承認，有修築龍州至南寧與龍州至百色二路之權利。一八九九年法國復獲得建造南寧至北海鐵路之權利。德國亦獲得修造津浦鐵路北段之權利。

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獨美國沒有加入。美國恐怕它商業在中國要受排擠，所以倡議門戶開放主義，得到各國的同意，宣言無論在任何一國的勢力範圍之內，各國在華的商業都得到同等的待遇。這門戶開放主義，雖然是爲了美國自己的利益着想，卻一時也挽救了中國「瓜分」之禍。其實英國此時遠東政策，也是不贊成「瓜分」中國的。在美國沒有提出這主義以前，英國議院中曾經屢次討論過保全中國門戶開放的問題。這是很合情理的：因爲英國是工業發達的國家，不怕競爭的，中國全部的市場總比中國一部份的市場更好。但是倡議這主義者是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氏 (John Hay)。

外國的侵略是一天天深，中國政府未嘗不想振作起來，以應付世界的大局。但是守舊的勢力，還是根深蒂固；康有爲的「百日維新」是很悽慘地失敗了，慈禧太后又重掌政權。在人民中間，仇

外的心理已醞釀了六十來年，至此乃一發不可復遏。拳匪的動機亦許是愛國的，但是他們太沒有智識了，以致反替國家增加了一重恥辱。辛丑和約是中國支付愚拙仇外行爲的一筆新賬：約中規定中國須懲辦禍首，遣使至德日二國謝罪，外人得駐兵保衛使館，並得在黃村、廊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留兵駐守。中國應毀大沽礮台，並賠銀四萬五千萬兩。根據辛丑和約第十一款，英、美、日三國均與中國改訂商約，增加長沙、萬縣、安慶、惠州、江門、奉天、大東溝、安東爲通商口岸。

不久，日本及俄國因爲在東三省及朝鮮爭奪權利，不能得到一個妥協的辦法，於是兩國的爭執，祇能訴諸武力。日俄戰爭（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的結果是俄國除了承認日本在朝鮮有特殊的利益外，把東三省南部的一切權利——長春以南的鐵道，旅順、大連灣之租借權——都轉移給日本。這轉移於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得到中國政府的正式承認。從此日本의脚是跨進了中國的大門，中國將不復有安寧之日矣。甲午之戰打敗中國是「大和民族使命」成功的第一步，此次打敗俄國是「大和民族使命」成功的第二步：日本的野心，不僅是爲亞洲的主人翁，

它還想做征服全世界的夢。在以後三十多年中，事實已證明日本才是中國真真的敵人，同時也是一個最野蠻、最殘酷、最不講道理的敵人。

先是，英國的遠東政策是聯日拒俄，因為日俄之戰以前日本的野心還沒有完全暴露出來，大家都以爲俄國是惟一心懷叵測的國家。迨日俄之戰以後，英國覺得俄國的危險已經過去了，同時歐洲的政治使得英俄成爲協約（一九〇七年）於是日俄兩國，經英國的居間，也攜手起來了。一九〇七年以後，英、日、俄、以及德、法、美等國家，在遠東都取合作的方式，向中國奪取權利。

此時，有識之士，都覺得外患日深，領土主權日益削滅，非國體之改革，內政之鼎新，不足以應付世界大局。一九〇五年，孫中山先生組織革命同盟會總部於日本東京，主張傾覆清室，建立共和政體。六年以後，革命黨即舉事於武昌。辛亥革命的遠因是鴉片戰爭以來的辱國喪權，清廷應付這世界大變局的失敗，它的近因是湖廣鐵路借款的問題，都是與外交有關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的目標是要喚醒中國人民民族國家的意識，領導中國人民改造這古老的國家，以期在國際間得到平等和自由。英國政府對於此次革命運動，頗表同情，並加贊助。當辛亥事變起，中山先生適在美

國；他覺得此時的外交工作，較之一切更爲重要，所以逕首途赴英，不卽返國。在英國他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絕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處英屬之放逐令，以便他取道回國。這三件事英政府都答應的。他自己記載經過的情形如下：

到英國時，由美人同志咸馬里代約四國銀行團主任會談，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先清廷與四國銀行團結約，訂有川漢鐵路借款一萬萬元（恐係六百萬鎊，合六千萬元），又幣制借款一萬萬元（一千萬鎊），合一萬萬元。此兩宗借款，一則已發債票，收款存備待付者，一則已簽約而未發行債票者。予之意則欲銀行團於已備之款停止交付，於未備之款停止發行債票。乃銀行主幹答以對於中國借款之進止，悉由外務大臣主持，此事本主幹當惟外務大臣之命是聽，不能自由作主也云云。予於是乃委託維加礮廠總理爲予代表，往與外務大臣磋商，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絕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處英屬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國。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許。予乃與銀行團主任開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該主幹曰：我政府既允君之請，而停止我人借款清廷，則此後銀行團借款與中國，只

有與新政府交涉耳。然必君回中國或成立正式政府之後，乃能開議也。本團今擬派某行長與君同行歸國，如正式政府成立之日，就近與之磋商可也。

民國成立以後，中山先生不願使國家久罹戰禍，致野心之國家，乘機干涉，收漁人之利，於是南北議和，政權終久是落於袁世凱及一班軍閥之手。此後十幾年來的政治，是極端混亂，極端黑暗的政治；內政既未見鼎新，外交亦未有轉機，俄國對於蒙古，英國對於西藏，都存有覬覦之心，而日本的侵略，則變本加厲，勢非滅亡我國不止。在民國成立之初，日本本想乘機出來干涉的，但是因為國際間有所顧忌，不敢斷然橫行。迨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發生，日本認為這是它在東亞橫行千載難逢的機會；第一，它先藉口英日同盟的義務，向德國宣戰，而其實在的目標乃在佔據青島及膠濟鐵路；翌年，它向中國政府提出我們人人所不能忘的「二十一條」，強迫中國接受。那時袁世凱有稱帝的妄想，不敢開罪於日本，同時他知道在國際間得不到援助，於日本提出哀的美敦書（五月七日）後，祇能接受日本的要求。但是從這件事後，我們人民對於日本猙獰的面目，都有了真切的認識，慢慢地潛養形成了我們今日抗戰的決心。

在巴黎和會中，山東問題是爲中日代表爭執之焦點。中國要求日本將山東半島連同完全主權交還中國，日本則堅欲承繼德國在山東的權利。此時英法代表，因爲與日本有密約，當然是袒護日本的。美國威爾遜總統（President Wilson）雖然高唱理想主義，但是他剛在富埃姆（Fiume）問題上，得罪了意大利，使它退出和會，因之在山東問題上，他不敢再得罪日本了，恐怕日本也退出和會。威爾遜、勞埃喬治（Lloyd George）及克里孟梭（Clemenceau）三巨頭會議的結果是日本的勝利。這消息傳到中國後，引起了激烈的學生運動（「五四」運動），結果是中國拒絕簽字於凡爾賽和約。

巴黎和會之後，軍備競爭問題及遠東問題頗有危害和平之可能，於是乃有華盛頓會議之召集。在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中，日本侵略中國，獨霸東亞的野心，遭受了適時的制止，因爲九國（美、比、英、法、日、意、荷蘭、葡萄牙、中國）公約中，第一條規定締約諸國（除中國外）：

（一）尊重中國之自主權與獨立暨中國領土與行政之完整。

（二）給予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

(三)施用各國之權勢，以期切實設立並維持各國在中國境內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

(四)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利，而減少友邦人民之權利，並不得獎許有害友邦安全之舉動。

同時門戶開放主義，也得到一更詳細的規定（九國公約第三條）：

為適用在中國之門戶開放或各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更為有效起見，締約各國，除中國外，不得謀取或贊助其本國人民謀取：

(一)任何辦法，為自己利益起見，欲在中國任何指定區域內，獲取有關於商務或經濟發展之一般優越權利。

(二)任何專利或優越權，可以剝奪他國人民在華從事正當商務實業之權利，或他國人民與中國政府或任何地方官共同從事於任何公共企業之權利，抑其範圍之擴張，期限之久長，地域之廣闊，致有破壞機會均等原則之實行者。



山東問題，在華盛頓會議中，也因英美兩國的調停，獲得解決。中日兩國，簽訂一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約，其要旨是：日本將膠州德國舊租地交還中國；日本撤退駐沿青島濟南鐵路及其支線之軍隊，中國派警隊或軍隊接防；日本將青島濟南鐵路及其支線，並一切附屬產業，移交中國，中國償還日本該鐵路之現值實價；中國將膠州租借地全部開為商埠。

關於中國要求關稅自主，取消領事裁判權等問題，雖未得到全部滿意，但是各國應允修正稅率，組織委員會考察中國司法制度，以決定取消領事裁判權問題。至於歸還租地問題，英國允諾交還威海衛，法國允諾交還廣州灣。

此外，英日同盟亦於華盛頓會議時取消，而代之以英、美、法、日、四國之太平洋公約，答應互相尊重彼此在太平洋一帶之領土。從此結束了二十年來英日在遠東合作的時期。

自從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南京政府成立以後，中國逐漸修明內政，重視建設，國家乃現統一之象。日本惟恐中國從此自強，將來不能遂其侵略之野心，所以趁世界經濟恐慌嚴重之時，各國無暇東顧之際，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於瀋陽。不久，即佔領我東四省，威脅

我華北。從此，它就明目張膽地進行它「鯨吞」中國的辦法。去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它藉口蘆溝橋事變，又侵佔我平津一帶，我國忍無可忍，乃全國一致，憤起抗敵。我們相信我們爲國家的自由而奮鬥，正義在我們這一邊，敵人無論如何殘酷兇暴，終久總要失敗的。

中日問題這樣嚴重，英國的態度怎樣呢？當日本初興之時，我上面已經說過，英國是非常同情於它的，並且極力給它援助：第一，因爲日本是西方文明模仿者，模仿是欽佩深切的表示，日本對於西方文明既表示欽佩，以宣揚西方文明爲己任的英國，對於它當然也發生好感；第二，因爲俄國在遠東野心勃勃，英國想培養一個日本出來拒俄。這是日俄戰爭以前英國在遠東的政策。英國親日的政策，一直到歐洲大戰以後，在巴黎和會，討論中日問題時，英國還是偏向日本的。巴黎和會以後，不但中日感情更趨惡劣，即日美邦交亦非友善。美國在華統傳的政策與日本在華的政策是根本衝突的。萬一日美發生戰爭，英國因爲英日同盟關係，必被牽入漩渦。所以在華盛頓會議中，英國毅然取消英日同盟。這是英國遠東政策的一轉變。但是這並不是說英國在遠東改取了一助華拒日的政策。英國與日本的友誼，雖然從此稍形疏遠，可是它們的關係還是友好。有許多地方，我們可以

看得到英日帝國主義在華的合作。這一時引起了中國人民對英的反感，而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慘案造成了劇烈的反英運動。從這件事起，英國漸漸地了解中華民族的覺悟，不可以次殖民地的方法對待中國了。國民政府成立之後，英國對於中國的自強建國運動，頗能諒解，從此中英邦交，日臻友善了。

「九一八」事變起後，中國訴諸國聯及巴黎非戰公約簽字各國。是時美國國務卿史汀生 (Henry L. Stimson) 頗願聯同英國，設法制止日本。但是英國外相西門 (Sir John Simon) 始終不願採取任何舉動，足以開罪於日本者。在國聯會議中，他簡直是代替日本人說話。日本的代表松岡 (Matsoka) 曾經說過，他幾個禮拜想說而說不到家的話，給西門在十五分鐘內，都說清楚了。這次英國縱容日本侵略，不但是中國的不幸，損失了一大片土地，就是對於歐戰以後所樹立維護世界和平的國際組織，也是一致命的打擊。從此國與國之間，又恢復到野蠻時代的關係，而世界無寧日矣。

接着就是意大利的侵略阿比西尼亞及德國的片面撕毀羅卡諾公約，出兵萊茵河非武裝區

域，後來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併吞奧國，同年十月取得捷克的蘇台德區，一九三九年三月實行以整個的捷克爲其保護國。歐洲集體和平的制度，頓形崩潰。德國與意國與日本，又締結了一不神聖的同盟，名爲「防共」，實則彼此合伙，各遂其侵略之野心。日本在中國，至此更無忌憚，在它兵力所控制的平津一帶，竟公然私販「劣」貨，破壞我國海關行政，實行鴉片政策以毒化我人民。歐洲政局的幻變與日本在華的橫行，使得英國感覺得它應當毫不遲疑地援助中國增加建國的力量，以抗禦日本的侵略。西門祖日的政策，在國內備受抨擊。這幾年英國在技術方面及物質方面，幫助中國增加了不少抗敵的力量——尤其是李滋羅斯 (Sir Frederick Leith-Ross) 的來華及我國幣制的改革，使得我國在經濟及財政上作了抗敵的準備。

這次抗戰以來，英國的政府及人民，對於我國都是極表同情的。可惜的是這同情，現在還不能化爲實際上的援助。英國現今外交的出發點，是在可能範圍內避免捲入戰爭的漩渦。艾登 (Anthony Eden) 去職後，首相張伯倫 (Neville Chamberlain) 及外相哈里法克斯 (Lord Halifax) 的政策更是趨向於現實主義的一方面。在歐洲，他們一方面是鞏固英法的聯盟，一方尙極力想與

德意妥協，慕尼黑協定後，侵略者的氣焰，更是囂張不可一世。這種的情形，使得英國朝野人士越來越認清楚侵略者無止境的野心。日本在華殘暴的行爲，如轟炸不設防城市，屠殺非戰鬥人員，襲擊民用航機，危害友邦利益，引起國外輿論一致的憤慨。英國輿論，頗有一部份主張對日採取經濟制裁的，政府對於這建議，在初還遲疑不決，下院且否決了借款與中國的議案，但是後來情形越來越明顯，使得英國也由遲疑而進於積極的援華，一變其往日的態度。本年三月英國對華的一千萬磅的借款，及助我發展滇緬的交通，都是近來這個政策轉變的事實證明，可見英國已經認清了事實而實行助我了。中英的邦交到此又轉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 第六章 中英外交之展望

英國詩人凱潑林 (Rudyard Kipling) 的預言是東方與西方永遠不會碰頭的。他假使現在還在世間，一定會覺悟到這句話是錯了。現在這世界，科學這樣進步，交通這樣便利，地球的任何一角發生什麼變故，它的影響全世界都會感覺到的，很難再劃分東方與西方的界限了。以最近的事實說，歐洲局勢這樣不安，戰機到處危伏，它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日本在東三省嘗試的成功。可見東方的事，如何會影響到西方。所以在現在的國際間，「洲」界不過是地理上方便的名稱，我們不能因為事情的發生離開我們遠，而取「隔岸觀火」的態度了。英國從前對於中國抗日的戰爭，僅取「口惠而實不至」的態度，那眼光未免太狹短了。我們且不論英國在華的利益，在日本軍閥手中，將遭受何等打擊！——事實上日本目前已着手驅逐歐美各國的商業於中國之外。即從大處着想，日本的得志當然會使得全世界的擾亂更無已時；因為它的野心是無止境的，英國無論對它

怎樣忍耐妥協，將來日本總有一天使得英國退讓得無可退讓，忍耐得無可忍耐，那時兩國的正面衝突乃不能避免了。說起來是似乎矛盾的：英國對侵略的國家，過去採取容忍政策，以免己身捲入戰禍，但是它的容忍，適足以增加侵略者的氣焰，而使得戰禍終久不能避免。

照目前的形勢看起來，中英兩國都是站在一個目標之下，將來可以合作的地方當然是非常之多。中國是東亞的安定勢力，中國若是強盛，世界和平就多一重保障，因為那時日本的法西斯主義不復能逞志了。所以英國援助我們抗戰建國，它也就是援助它自己，它也就是援助世界和平。

再從實際的利益方面說，英國與中國，也祇有互相輔助的地方而沒有互相衝突的地方。商業是英國來華最大的目標：三百年前威特爾（Captain Weddell）領了第一隻船到中國海岸來，爲的是要與中國通貿易；十九世紀中英國兩常用武力來打破中國閉關的門，最主要的理由是要改善中外通商制度；此後七十多年來英國對華的政策，它最先也總是顧到它經濟的利益。英國是極度工業化的國家，海外貿易是它的生命。它有多餘的資本，它有多餘的產品，它需要市場，它需要投資的地方。它現在殖民地遍天下，所以它的外交政策，除了要保全它已得的殖民地外，經濟的發

展要算是重要的主動力。中國是工業落後的國家，在建國的途程中，它需要國外的資本及技術方面的援助。所以英國在華投資——不含帶政治性質的投資——中國是絕對歡迎的。同時假使中國一天天強盛，人民的購買力一天天增加，世界上那裏有比中國更好的市場？所以中國沒有阻礙的發展，不但是它本身的利益，亦且是英國以及其他志在與華通商各國的利益。

但是自從日本侵華以來，在它所占據的區域以內，任意摧殘各國在華的經濟利益。「滿洲國」是不用說了，早已成爲日本的禁地。就是在華北，在不公平待遇之下，市面上也祇見日貨充塞了商店，最近它且有想佔取天津英法租界的計劃。在揚子江一帶，它現在宣稱尊重門戶開放主義，但是當初它對於「滿洲國」也何嘗沒有同樣的宣稱。日本近幾年來瘋狂的行爲，已使得世界無復能相信它的諾言了。所以假使日本做了東亞的主人翁，各國在華的營業，祇有準備全部退出。

總之，英國在東亞的利益，處處與中國的利益相吻合而與日本的利益相背馳的。英國遲早總會看到這一點。所以中英的外交關係，在歷史上雖然不甚愉快，但是它的前途，應當是有無限的光明的。這個無限光明的前途就在此時發現了曙光。一九三九年是鴉片戰爭一百周年之時，中英兩



國在這一百年中發生了密切的關係，在這一百周年的際會，正是中國與侵略者作殊死鬪爭之時，就在這個時候英國開始了援助中國的機運，它的對華政策較之一百年前固然改變，較之一九二七年時也有顯著的進步，使得兩國國交，益臻友善，這一百年來的交情有了這個良好的結果，前途真是無可限量的。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初版

◆(35425.1)

中 英 外 交 一 冊

每冊實價國幣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著 者 沈 惟 泰

編 輯 者 藝 文 叢 書 編 輯 部

出 版 者 藝 文 叢 書 編 輯 部

長 沙 南 正 路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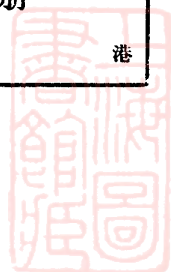
長 沙、重 慶、成 都、西 安、南 昌、金 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梧 州、昆 明、貴 陽、香 港、汕 頭、福 州、

(本書校對者喻飛生)

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2608B





~~401913~~